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一九期 ——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9d)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 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 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动态】

在武汉大学讲文革

胡发云。

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到一个敏感的地方,由一个敏感的人去讲一个敏感的话题,真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5月22日,受武汉大学学社联邀请,去做一个讲座。他们希望我讲讲文革,如何讲,由我自己决定,没有任何限制。看来,这样一桩数十年来被极力遮掩、篡改,巴不得天下人都忘光但又天天在延续着的陈年旧事,依然在今天的年轻人心中深深地盘踞着,求真的种子,没有灭绝。

我给了一个题目:《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我想从我们这一代人——共和国的同龄人的成长经历,来讲文革发生的必然性。

文革是一场全民族都倾情投入的历史大戏:宫闱、诸侯、军地、城乡、派系、阶级、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不同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诉求——不同阶段,不同的角色轮番登场。文革像一头巨象,我们每个人都只摸到它的某个局部。要把事件本身弄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全国各地、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各种阶级地位、各种不同结局的人都能够参与。文革是亿万人投入的政治事件,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它又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如果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又不利用这种资源,那就比付出代价本身还要可悲了。

我曾笑说,要讲透文革,是要全国的高校里长期开几门课的——文革学,文革美学,文革语言学,文革经济学,文革社会学,文革心理学甚至还有文革女性心理学······

在十多年前一家刊物的座谈会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在1978年匆匆忙忙把文革打了个包,束之高阁,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谁都不要看了,也不要清点,反正我们已经作了结论了。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者或是其他参与者、关心者,对文革研究的自由度还是非常小的,这有种种原因,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文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并没有结束,它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及其他种种依赖关系,依然制约着我们对文革的正常表述或思考。现在已有一些官方性质的文革史,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去补充,它们以后就会成为正史。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不进行甄别的话,这些人死后,这些文革史更是白纸黑字,不可改变了。老百姓参加文革的动机极其复杂。右派、胡风分子、大学教授等一些知识分子,这样一些不在体制中心的人,他们参加文革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1957年相近,有疏离体制和反体制的情绪在里面;社会底层也是这样。这些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各阶层自己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群在新体制下的心态和利益及其在文革中的要求和反映,都很有研究价值。

……至今为止,我们对文革的研究依然是在一种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进行,有很多规定好了的解释你不可能突破。现有的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纪实作品或理论研究著作,都时时可感觉到一种隐匿现象。有一批隐匿者,就是今天依然在台上的一部分官员,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依然是不可言说的。所以,文革最终的结果,是一大批的隐匿者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重新寻找这些文革的隐匿者,让他们重新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一部分责任,让他们发出自己对历史该发出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直至今日,我们会如此艰难地面对文革这个话题,我们会面对如此多的怪异和吊诡的现象。

不久之后, 刊登我上述发言的这家刊物就被停掉了。

有的学者和网友常把二战后德国对于法西斯运动,二战暴行的深刻反思与中国对于文革反思进行对比。我说,这是不可比的,二战结束,希特勒德国战败,纳粹组织彻底瓦解,纳粹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纳粹运动终结。具有宗教传统和理性精神的德国人,痛定思痛,用一种煮骨焚心的勇气清算着那一段不堪的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我们依然能看到他们在《朗读者》、《浪潮》一类文学艺术作品中深深地思索着,反省着,他们痛苦又凌厉地追问自己,追问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父母和前辈。而那些在纳粹运动中犯有罪行的人,除了被审判惩处的之外,隐匿的、逃亡的,一直到今天也没有逃脱被追缉的命运……而我们这边,只是宫廷内部换掉了一批人,方针政策做了一些调整而已。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样式,文革结束了。但是它的内核依然坚固地存在着,甚至它的组织框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价值体系也依然存在着,有时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当我看到德国总理勃兰特 1 9 7 0 年在波兰华沙的犹太民族纪念碑前双腿长跪照片的时候,我曾想过,我们的国家首脑,什么时候也能为那大半个世纪以来数以千万计的罹难同胞真诚痛禁地一跪呢?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祖国复兴的开始。

讲座一开始,我就说了,1966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3年,43年,足够生长出两代大学生。但是这个话题依然讳莫如深。今天这个晚上我会就我的经历,我的思考,尽可能坦率地表达,你们也可以尽可能地大胆发问,包括说出不同的看法。

尽管武大和许许多多的高校一样,二十年来萎缩得厉害,但我的那些年轻的学弟学妹们还是让我非常意外。对真理真相的渴求,是不可遏制的。讲座开始前一个小时,能坐二百多人的教室已经满了大半,余下的也用书本书包给占着了。后来的人,只好坐在走道的台阶上或站在后排。原定主讲一个半小时,答问对话半小时。同学提问刚开始,纸条(用一句中学生作文的语言)就像雪片一样飞上讲台,还有许多举手要求口头提问的。只得尽可能地简短回答了。

大家的提问让我知道了,他们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对那段数十年前的历史一无所知或只知 道教科书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他们思考的深刻与独特,让我必须坦率地说出我的观点。对于这 样的青年,任何的含糊其辞或王顾左右而言他都是可耻的。

以至后来有一位男生兀然站起来径自就说了:我看见这么多条子,我知道我要不这样,今天晚上我就没有发言的机会了。他说,据我了解,今天晚上有安全部门的人在这里,不知道对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位好心的小伙子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在提醒我。我笑笑说,我欢迎他们来听我的讲座。我所说出的一切,都是可以公之于众的,如果主流媒体愿意,也可以发表的。他们到这里来,是工作的需要。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我想他们也会有内心的判断,他们也会在知道了各种信息之后,进行自己的思考。我说我曾经将一些他们感兴趣而且要汇报的谈话录好音,让人带给他们,让他们更完整更准确地知道我说了一些什么。只有公开坦率的对话,才能用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个晚上,有两架摄像机全程录像,一切都被记录着。一切都无需掩藏。

然后我继续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9点,是讲座原定结束的时间。但是大家依然在提问,在对话。一直持续到 1 0点过了。 主持人说,再回答三个问题结束。结束之后,一些同学又围过来,说着想说的话,要走了,几 个同学借送我那一段路的时间,说着他们的思考、惶惑与追寻。

短短三个多小时,能涉及的话题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我和他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来继续探寻与思索。特别是这些二十上下的孩子们,他们还有很多的岁月。

我的结束语是:文革并没有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之变,并不是文革的结束,只是数千年来那些如同"玄武门之变"的宫闱故事一样,先帝驾崩,继任人之间的一场较量……1978年11月25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是文革的结束……只要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我们就永远生活在文革的阴影之中。

□ 原载《记忆》2009年总第32期

【史实辨析】

林彪为叶群开过"处女证明"么? ——兼考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整理问题 我在网上提到敬爱的林副统帅在1966年5月间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向与会同志散发"叶群处女证明书"的丑事,某网友引用余汝信先生所著《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告诉我那事乃是民间虚构。我当即引了与会者李雪峰同志的证词: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面对主席台的左手。我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来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

- (一) 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 (二) 叶群与王实味、XXX根本没有恋爱过。
- (三) 老虎, 豆豆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
- (四) 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他刚开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什么资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聂帅拿着林彪手书,生气地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与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的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议,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华夏文摘增刊》,第194期)

然而那位网友却认定这是我党捏造的,说什么:"那个回忆不过是后人'帮助'老李回忆罢了,你也当真?"

这当真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了,但凡高干回忆录一概是捏造。可惜这位网友当作权威引用的余文也使用了中共文献。研究中共党史,不甄别鉴定使用共党来源的材料,还有什么史料可言?重要的还是怎么使用逻辑推理,结合常识去对史料作真伪辨析,这儿的"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文献本身的真伪(authenticness),亦即是否好事者的捏造,以及内容的真实性(truthfulness)。

先看第一个问题。此文不但发表在1998年第四期《百年潮》上,载于国内各大网站,包括《中国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而且还被选入由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回首"文革"》,可见并非民间流言,亦非好事者捏造,而是获得官方认可的以李雪峰名义发表的回忆录。史料出处无可怀疑,可以认定是 authentic 的。

再看内容是否真实。我认为李的证言基本可以视为 truthful, 依据如下:

一、李的回忆录含有大量不利于共党形象的内部信息,如毛刘之间明争暗斗;刘主持会议时,知道矛头是对着他来的,却又无可奈何;彭真等人倒霉后大众立刻变脸;李雪峰和李富春奉邓小平之命,去通知陆定一不许他再出席会议时,两人都不想开口,磨磨蹭蹭指望对方传达那指示,在陆呼冤后,什么安慰话都不敢说的尴尬……,等等。这些烂事只能暴露我党整自己同志的冷酷无情以及高干们的凉薄势利,现在的中央不可能去捏造这些丑闻,更何况该回忆录是在李在世时发表的。

二、李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最先整肃的对象,搞李是毛的倒林部署之一,所谓"扔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就涉及到他。林彪集团从未得罪过他,他反而最先受了林案株连。以他如此背景,根本没有意愿和必要去丑化林彪。中共就算要伪造这种丑化林的内幕消息,也该安排个合适人选,彭真、吴德就远比他合适。

三、回忆录含有非常逼真生动的细节,例如李正在看桌上放的林彪证明书时,彭真来向李交代工作,突然听到后面有人攻击他,转过头去叫:"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双方吵了起来,让刘压下去了,接下来便是聂荣臻嚷嚷把林的证明收回去。这情景至为生动逼真,很难虚构。更不用说捏造这些事只会暴露我党高层的丑态,并揭示了刘少奇一彭真集团乃是林彪造神运动先驱,而这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刘、彭就是靠捧毛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上去的,林彪不过是师法他俩的故伎而已。这些记述对我党整体形象具有强大的抹黑作用,难道我党还会去故意捏造?

四、如所周知, 1966年5月召开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了解决彭、罗、陆、杨问题。这四人并非有组织的集团,搞他们的动机和借口也各不相同,整彭是毛的意思,目的是搞掉刘的大将,最终倒刘,借口是"二月提纲";罗本是毛的心腹,毛同意整他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效忠,借口是他夺林的权;整陆定一的主要借口就是严慰冰匿名信事件,主要是林彪报复,当然毛也想借整陆证明文化界成了"黑线专政";整杨则是毛报复"窃听器事件"。

因此可以说,这四人中,毛林各想整两人。林彪在那个著名的讲话中就专门骂了这几人,特别提到匿名信事件,说陆定一是后台。既然要整陆,当然免不了要出示罪证,所以林彪当然要写那个证明书,以消除副作用。我党高干满脑子全是传统社会那套腐恶,元帅作乌龟,当然要觉得是奇耻大辱,林势必出来证明小叶是纯洁的处女,否则他那乌龟不是当定了?

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李雪峰此段证词基本可信,林彪确实在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了叶群的"处女证明"。

更何况王力在回忆录里也提到此事,他不但证实政治局会上把林彪提供的处女证明发给到会者,明说林的处女证明中提到的 X X X 其实是陆定一,还把林彪骂脏话的事也给兜出来了:

"(五月)十九日批评彭真、陆定一,……陆定一早就受审查了,就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这就涉及公安问题,一定是能够掌握林彪的行踪的人写的,林彪到哪里她都知道。经过侦破知道是严慰冰写的。告诉陆定一,陆大吃一惊,说他不知道,说严慰冰有精神病,找医生证明。一九六五年中央决定要彭真审查陆定一,看是严慰冰单干,还是有个夫妻店。要陆定一离开北京。陆定一到外地后,给严慰冰打电话都有人窃听,陆电话里说给严买了个半钢的表,这句话被说成是暗语,因为无锡话'半钢'和'半讲'同音,说这是暗示严慰冰只能讲一半,不能全讲。这是叶群在大会上讲的。彭真审查陆定一的结果,说陆确实不知道严写匿名信,林彪很恼火。政治局会上林彪写了一个条子,证明他和叶群结婚时叶群是处女。这个条子印出来发给到会人。陆定一发言没有说几句,林彪就质问:你为什么要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陆定一说我确实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说了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批判变成了闹剧。有人说林彪在会上说'我恨不得枪毙了你',这话是没有。还有人说,陆定一说丈夫不知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这好像是顶嘴了,这话也没有。"(《王力反思录》,391-39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两份证词只是事件发生日期有出入,李说的是5月11日,而王说的是5月19日,但王的证词中插有倒叙,5月19日说的是批斗彭、陆的那天,并不一定是林彪印发处女证明那一

天。即使日期真有出入,两人所述的基本情节也一致。王力的身份与李雪峰截然不同,至死也 未获平反,回忆录是在香港发表的。两人串通捏造同样故事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王还特地 澄清了两条不实传闻,态度相当认真。

因此, 余汝信先生所说"有关林彪对陆、严及有关匿名信一案所涉的讲话、批示、甚至什么'处女证明'等等……皆可视之为街谈巷议,不足为凭",乃是无据豪断,不能成立。

其实,那位网友作为权威引用的余先生的文章我早就看过了,觉得无法成立。余先生不但忽略了重要目击者提供的第一手证言,而且连林彪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中痛骂陆定一和他老婆的那些话,也毫无证据就认定是后来加上去的(当然他只是暗示,没有明白说出),此乃典型的"主题先行,以论带史":自己先认定林彪不知道匿名信事件,由此导出他不曾在政治局会议大骂陆定一夫妇的结论,却除了不足为凭的街谈巷议之外又拿不出过硬的否定证据,最有趣的是他否定"处女证明"真实性的论证:

"5月18日,林彪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称:'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以上为中央文件的原文。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林彪当时所讲的原话,还是事后经人整理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讲话的文本是迟至当年9月才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目前已公开的林彪讲话,绝大部分是别人事前代拟或事后经人整理的,这篇讲话,也不例外。故而单凭这篇讲话,难以判断此时的林彪对匿名信一事到底知道了多少?

除却上述讲话之外,有关林彪对陆、严及有关匿名信一案所涉的讲话、批示、甚至什么'处女证明'等等,传闻甚广,不一而足。但从未见到中央正式文件有所提及或引述,故而,皆可视之为街谈巷议,不足为凭。"(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华夏文摘增刊》,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原来,作者所谓"考证辨伪",就是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但凡"从未见到中央正式文件有所提及或引述"者,"皆可视之为街谈巷议,不足为凭"。难道余先生竟然认为,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过林彪为叶群作的处女证明,中央就一定会以正式文件转发全国,而若是中央没这么做,那就足以证明没有那事?党中央就是再下流,似乎也用不着把这种三姑六婆才会关心的烂事当成国家大事通告全党吧?莫非叶群同志婚前完整的处女膜,竟然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幸福线?

而且,既然"从未见到中央正式文件有所提及或引述者,皆可视之为街谈巷议,不足为凭",相信"中央正式文件"到了迷信的程度,那么,林彪大骂陆定一夫妻的话见于中央下发的林彪"五一八讲话"中,为何又不足取信呢?原来,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林彪当时所讲的原话,还是事后经人整理的结果。"既然不知道,那就不能轻率否定吧?可他却又能得出"单凭这篇讲话,难以判断此时的林彪对匿名信一事到底知道了多少"的结论,同时还能一口咬定"严慰冰的匿名信,家人及工作人员从未向林本人透露过点风声"。作者怎么会看不出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来?

林的公开讲话诸如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之类当然是事前由别人代拟,但在内部会议讲话多是即兴发言。"五一八讲话"一开头他就说:"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过后当然会让文人校对所用历史典故,并整理为比较通顺的书面形式,但这决不能成为"骂陆定一夫妇的话是后来加进去的"的"学术证据"。那文章的主旨是大讲阶级斗争,大捧伟大领袖的,骂陆定一夫妇不过是附带出气而已。难道辱骂陆定一那几句话竟然是事后必须追加的忽略了的重大战略问题?就算是吧,那毛(或其他人)又有什么必要追加上陆的老婆?难道那也

是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部署,万万不可遗漏?

最有趣的还是,就连那讲话是九月间才发下去的,也成了余先生的怀疑理由。其实毛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得清清楚楚,"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一直催着要发",是他本人推迟的,还给出了理由。虽然那理由是否真实值得研究,但如果认为毛是为了要加入骂陆那段话,特地把文件的下发押后了整整四个月,那就是天方夜谭了。

然而根据这种推理,余先生就可以不但将"处女证明"斥为"街谈巷议",而且还能根据真正的街谈巷议,便认定"严慰冰的匿名信,家人及工作人员从未向林本人透露过点风声,既然连文件都不看且又不知情,林怎么可能亲自看过匿名信"!

好在余先生后来总算是否定了自己,虽未承认"林彪没看过匿名信"是他的错误猜测,毕竟还是肯定了林的"五一八讲话"的真实性:

"林彪不善言语。现在所看到的他的讲话文本,并不是他发言时的原话,林彪说话,语言远没有这般流畅。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讲话文本,已经过旁人精心润色。据戚本禹告诉笔者,林彪的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由戚作进一步加工,戚基本上是按记录稿作了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润色,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

不可否认,讲话文本中的思想精髓是林彪本人的。戚本禹日后也承认,林讲话"有点历史唯心主义",惟林彪看过整理稿之后十分满意,称赞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经过整理润色的讲话文本,文字铿锵有力,甚具戚本禹文风。"(余汝信:《短暂的蜜月:1966年毛、林关系的几个问题》,《华夏文摘增刊》,第617期,2007年12月24日)

在此,余先生总算承认了"戚基本上是按记录稿作了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润色,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没再坚持暗示攻击陆氏夫妇的话是后来追加上去的。

但他所谓"林彪不善言语"又是豪断了。林平时少言寡语,但那不过是性格,并非没有口才。据他自己说,他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顺口讲(张云生:《毛家湾纪实》,210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具体操作是让秘书"拉条子",写个提纲即兴发言,还讲得非常生动。例如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扔开秘书事前写的讲稿,随口发言,深得毛的欢心,当场起立鼓掌,过后还问罗瑞卿有无那本事。五一八讲话当时也获得一片赞扬声(见下引王力语录)。同年10月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是如此。就连九大政治报告他都想搞成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让秘书准备一个他口头讲话用的"条子",后来是因陈伯达的报告稿子被批,他才放弃了在九大上作口头讲话的打算(《毛家湾纪实》,210-212页)。

在作口头演说时,林彪常常锋芒毕露,专讲通俗生动、独出心裁、旗帜鲜明的过头话,如毛一般富有个人特色与原创性,气魄也很大,诸如"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最高最活"、"顶峰"、"两杆子"、"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辩证法就是变化法"、"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大破一个私字,大立一个公字"、"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大罢一批,大提一批"、"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把世界当成一个国,世界国;中国当成一个省,中国省,争取一省到数省的胜利"等等,根本就不是戚本禹一类文字匠人想得出来的。即使能想出来,也没有胆量如此标新立异。作者所谓"经过整理润色的讲话文本,文字铿锵有力,甚具戚本禹文风",似乎只能说明他既不熟悉林彪讲话的生动个人特色,又不熟悉戚本禹的文风。

其实就连那讲话是否真为戚本禹整理,都还需要进一步求证,据王力说:

"林彪的政变经别人都说很好,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都说要印发。林彪要陈伯达、刘

志坚找了些秀才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整理了很长时间,讨论修改过几次,直到十一中全会后九月二十二日才印发。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说他不那么赞成,是跟江青说的。"(《王力反思录》,390-391页)。

王力没说那些"秀才"到底是谁,但不大可能包括戚本禹在内,盖戚其时已崭露头角,成了王的同僚。如果真是戚整理的,王不大可能忘记,更不可能故意忽略不提。而且,林彪最可能找的人,还是他看重的陈伯达以及军队系统的刘志坚(王力说 "刘志坚是林彪的主要秀才",刘进中央文革就是林彪提的[《王力反思录》,397页])。从戚本禹当时的地位与组织渊源来看,他也不大会是刘志坚物色的"秀才"。因此,不能排除余先生照单全收了戚本禹的自吹。比较慎重的态度,还是只能认为那是戚本禹提供、但与王力的证词不符的孤证。

不仅如此,尽管余先生和王力都说那讲话经过长期整理,似乎是作了很大的修改。真情是 否如此,我看颇值得怀疑,因为林彪那个讲话的许多警句不久就公开发表在报刊上: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16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里 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 有矛盾。……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那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以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会有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1966年6月2日)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 9 0 岁、1 0 0 多岁, 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9 6 6 年 5 月 1 8 日)

"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1966年6月4日)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 (《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1966年6月8日出版)

这些都是林彪讲话的"精华部分",过了不到两个星期就让陈伯达等人写进社论中。尤其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类口号,我党过去从未提出来过,也只有林彪才能说出来,世上并无第二人敢这么说,遑论是捉刀的文字匠们。

讲话中另一极富个人特色的口号"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是这样。根据余汝信先生的文章,早在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它。1966年5月28日,《人民日报》也在第一版用大字分五行横排刊出这语录。6月15日《新华日报》也照样刊出(丁群:《江青批示与新华日报的厄运》,《百年潮》,2001年第4期)。1966年7月1日,这口号又再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1966年7月1日)。

由此可见,后来下发的讲话中,至少"精华部分"是林彪的原话,而在文革初期广为传诵,起到了巨大煽动作用的也就是那些话。余先生所谓"现在所看到的他的讲话文本,并不是他发言时的原话"云云,看来又是一个凭街谈巷议作出的豪断。

而且,据余汝信说:"8月1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将林彪'五一八讲话'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印发予与会者",但直到9月22日,该讲话才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余汝信:《短暂的蜜月:1966年毛、林关系的几个问题》)。鉴于两份文件不可能有很大出入,可以将8月11日定为该讲话定稿下限。之所以要推迟到9月22日才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看来还是因为毛压了下来,而不是因为还在修改中,更不是如余先生大胆假设的那样,是为了要追加辱骂陆定一夫妇的话。

这当然不是说余先生那篇谈匿名信事件的文章一无是处,他否定严慰冰干的那桩烂事还是

正确的。匿名信事件乃是共党高层的丑闻,充分暴露了那伙人是些什么样的烂人。严慰冰居然有本事几年如一日写匿名信去用下流语言和谣言辱骂叶群,而林彪竟然将这种三姑六婆的吵闹,当成陆定一的反党罪行甚至"政变证据"痛加整肃,捅到最高权力机构召开的正式会议上去,当成将文革推向全国的重要理由之一,同时又怕那些谣言起副作用,让自己变成乌龟元帅,因此开出那腾笑千古的证明书来。这种种不堪入目、难以置信的丑事、臭事与笑话,也绝对只有那痞子党才能闹出来。

2006年7月7日首次贴出 2009年6月5日补充修改

【亡灵祭坛】

红八月与红卫兵

王友琴。

◇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自称为"红卫兵"的学生

那时全国的大学和中学已经停课开展文革两个月。六月一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指控北大领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工作组"被派到各大学中学掌权,号召学生揭发"斗争"校领导与教师。后来工作组被中央否定。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发出中央文件,不准学生"乱斗"。

随着工作组被撤销及红卫兵在各学校掌权,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全面展开。以红卫兵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为例,红卫兵建立了校园"专政队",对领导干部和教员"劳改",并且以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挂黑牌、戴高帽子等手段侮辱和野蛮殴打。校长万邦儒被打得肾脏出血,头上被打出裂口长期不能瘀合。副校长韩家鳌的头被按在火盆里烧,打伤后不准就医。红卫兵强迫老师和干部成排跪在教室大楼的阶梯平台上挨斗。

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推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高一女生杨爱伦,初中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校运动队,校文工团独唱演员,父亲曾是旧政府职员。因此,红卫兵领导人说要"杀鸡给猴看"。红卫兵在班里开会斗她,揪她的辫子,打她,踢她,强迫她低头下跪。她被单独关押,去食堂吃饭由同学押着。一个星期后,八月八日,她逃出学校,在清华园火车站寻死卧轨。疾驶而来的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在同一地点,文革后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长的俞伟超也在被斗争被打后卧轨而被火车头推出轨道但变成瘸子。)杨爱伦受了重伤,失去三个手指,头部缝合的伤口有一尺长,幸而未死。(二〇〇八年,该校红卫兵卜伟华写文章却说,杨爱伦"只受了轻伤"。)除了教职员以外,该校还有杨百龄、陈向明、张蕴环、王淑英、孙淑绮等女同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并且遭到殴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郭兰蕙获知下星期要斗她时,服毒自杀身亡。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观"。

文革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手段上和希特勒、斯大林有所区别,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专政"。因此,红卫兵在施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红卫兵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以家庭出身作为入伙标准,使其暴力倾向更为放肆无忌。这样一整套迫害方式,清华附中是最早配套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之为"清华附中模式"。

◇ 八月五日,红卫兵开始打死人

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三九五号文件,撤销刘少奇的三一〇号文件。影响巨大。无异于发出了暴力准许证。同一天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中(西单附近)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折磨殴打的过程持续数小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和她一起被打的还有另外四名学校领导人。卞仲耘被打死之事立即被报告中共北京市委以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但是上面没有派人来制止红卫兵打人。(二〇〇六年,南京的电影制作者胡杰把卞仲耘的故事制成纪录片《我虽死去》。片中有她被打死时的血衣和打坏的手表等实物,也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处理尸体时写下的字据。这纪录片在香港获奖并已经被翻译成德文,但在中国不能公演。)

十二天以后,八月十七日,北京一〇一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在学校喷水池边被打死。同时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师。初三女生吴芳芳,被指控撕坏一张毛泽东像。她的父亲是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也算家庭出身不好。她遭到毒打,还和陈葆昆尸体关在一小屋里。她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没有康复,由父母照顾。(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制片人卡玛当时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的电影里没有报导这类红卫兵暴行。影片中出现的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成员,都没有为红卫兵暴行表示道歉。那五所中学有九人被红卫兵打死。)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上诉、专业执刑。把文革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显然不符合事实。

◇ 八月十八日毛接见红卫兵暴力升级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高呼万岁的红卫兵。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些红卫兵头头几乎全是高干子弟。八一八大会向全国实况广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这样的接见以后还有七次。一千多万红卫兵得到免费火车票和食宿来到北京,被称为"革命大串连"。

北大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六六年八月,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三个人。而师大女中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八一八大会上得到的显赫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再清楚不过。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八一八大会前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有二人。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竟打死了一千多人。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在八一八大会后回到党校就被抓去"游街"、戴高帽子、手里敲着 簸箕自报"罪名"。中央党校干部说,这是中学红卫兵引导了高层理论机关。

十九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三 所中学的领导干部。在舞台上,教育局长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 他们的血流在舞台上。从那时候起,剧场、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 野蛮血腥之地,延续多年。

八月十九日晚,位于北京和平门的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两名教师张辅仁和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从八月十九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八月二十日上午,沙坪和几十名教员干部跪在全校人面前被斗和殴打。沙坪在中午时候死亡。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块砖头,额头打破,流了一地血。数学教员张梅岩上吊身亡。一位教师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都是中学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动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八月十九日被斗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二十日早晨坠楼身亡。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八岁九岁十一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

清华大学校长、高教部长蒋南翔在西单家中遭打二龙路中学红卫兵毒打。目击者说,红卫 兵命令他跪在地上,用铜头皮带抽他的后背。打了一阵,掀起他的衬衫说背上的条状伤痕分布 不对称,接着又抽打伤痕较少的半边。

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八月廿三日,北京市文联的廿八名作家、演员和领导干部在文庙(现在是博物馆)遭到红卫兵毒打,其中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在第二天投湖身亡。八月廿四日,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并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租住他家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他们的哀嚎传到四邻。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八月廿二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行动,特别介绍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还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

八月廿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北京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他们在清华大学里打人,抄家。此前暴力主要由中学红卫兵施行,这时传到了大学生中。那一天,无线电系教员被打,血流在地,有人在旁边写了"狗血"二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跪在地上被打还被剪了"阴阳头"。然后,他被挂上黑牌去拆除一九一一年为清华建校所造的汉白玉牌坊。牌坊被拉倒后,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搬走石头,还在他们身后用鞭子打他们。六七年在那个地点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林彪为此塑像题字。(这个塑像已在一九八七年被拆除。但是前两年有人写书题为"四个伟大毛泽东",书名显然来自这个林彪题词。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也都不知道这座俗称"二校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

清华牌坊是旧学校制度的一个象征。拉倒这个牌坊,殴打侮辱学校的教授,当然是对教育制度的打击和破坏。"红八月"的校外打击目标是有房产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抄家甚至打死。红卫兵命令人们交出房产证。面对被打死的恐怖,人们到房管所排队上缴房契。在北京有五十万间私房被没收,从此共产党一直没有取缔的房屋私有就被彻底结束了。"红八月"还改变了当时的"集体制"企业。例如,文革前的理发店虽然已不再是私营,但是理发师的收入是按劳所得。这种分配制度在那个月也被取消。

八月廿四日这一天,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三位数。每天公安局和其 他情报机构向上报告死亡人数。

◇ 八月廿五日,杀戮第二次升级

八月廿五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中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三个人: 语文老师靳振宇,学校书记江培良,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当日发生在崇文区的一个事件成为已经十分严重的红卫兵暴力再次升级的藉口。

廿五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广渠门内大街一二一号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从 前曾是小资本家,产业早已没有,他自住房子的房产证也已经在前一天交给了房管局。抄家过 程中,红卫兵说他打了红卫兵(文革后有红卫兵承认说没有其事)。李文波当时就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刘文秀在九月十日被法院判处死刑,两天后被处决。文革结束后他们夫妇得到平反。

当日夜里,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把该校校长梁光琪活活打死。梁光琪的儿子痛心地说,他那时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参加过抄家打人,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也被红卫兵打死,他说为此"后悔一辈子"。

第二天上午,在清华大学西大操场召开了全体"红五类子弟"大会(与这个特别的词语对应的"黑五类子弟"在文革中成为迫害的新对象之一。而北京的主体居民都不是"红五类",这是新一轮的摧毁城市文明的手段。这种分类法,后来在红色高棉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在清华大学附中立即开始更疯狂地殴打所谓"狗崽子"和"黑帮"。高三学生戴建忠、郑光召等遭到毒打后继续在抽打中"劳改"拔草。然后被罚每人写一百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贴到各学校去。那天下午,团委书记顾涵芬(女,清华大学一九六〇年毕业生,当时三十岁)那时已经被剃了头发,和副书记刘澍华(物理老师)跪在高二的教室里被斗。

顾涵芬的衣服被打得满是窟窿(八月炎夏只穿单衣),她背部都被打烂了。特别严重的是她的左眼被铜头皮带打伤,眼睛肿大鼓出来,快有鸡蛋大。她丈夫来把她背回家。他们上医院时,需要有红卫兵开的证明信,还有两个红卫兵押送去。(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已经刻了一个圆形公章。用在对被打死的人的尸体处理的信上。可见红卫兵暴力已经相当制度化。)她的眼睛从此失明。文革后"落实政策",大学给她买了一副墨镜了事。打她的红卫兵,直到二〇〇九年也没有向她道过歉。

八月廿六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五楼大教室召开斗争会直到深夜。刘澍华跪在教室前面,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和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等人。会后,刘澍华爬上清华校园内的大烟囱,跳下身亡。

八月廿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印发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其中第三点说:"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没有说出是哪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二〇〇九年卜伟华说这指的是李文波事件。但是李文波事件中根本没有红卫兵被打死,连受重伤的都没有。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份传单显然是在说谎,为的是煽动起更残酷的迫害。

从北京市红八月每日打死人数统计可以看到:李文波死后第二天,八月廿六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八月廿五日到廿六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八月廿六日到八月廿七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九月一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被打死人数低下来,是因为那一天毛接见百万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停工一天,死人相对少了。

九月一日发生了北京杀戮的最高峰,一天内有二百二十八人被打死。那天以后数字骤降,原因也很清楚。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效果。说明暴行是可以控制的,不是现在有人说暴行产生是因为"失控"当局无能为力。

从北京市红八月每日各区打死人数统计可以看到,离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区数字最高。其他

被打死人的很多区,也都是距离中南海很近的。北京六中和中南海仅一街之隔,该校红卫兵在他们的校内监狱中就打死了三个人,一个退休老校工,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以及附近一个拥有房产的老人。

八月廿七日,在北京宽街小学(在市中心),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同时遭到毒打,两天后死亡。连小学生也成为凶杀犯,可见红八月暴行已疯狂到何等地步!

八月廿九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第四号通令",其中第七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而且,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且作为"阶级敌人"遭到批斗,很快死去。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三十一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九月十三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 中共中央炫耀红卫兵打死人战果

篇幅限制,本文不能详述八月发生在北京之外的暴行。实际上,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和乡村学校中,都发生了类似暴行。在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找不到一所没有殴打侮辱老师的学校。但是相对来说,红卫兵暴行在外地没有北京那么严重,在小城市也没有资讯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严重。这是因为这场八月恐怖,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是在文革最高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六六年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六七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六六年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是最高当局煽动、纵容和赞扬红卫兵血腥暴力的铁证。

换言之,发动青少年红卫兵打死人的做法,没收私人拥有的房屋,搜刮民间存有的黄金,驱逐近十万人出北京城,都顺利完成,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不用这些残忍的做法,这些"革命"目标也可以完成。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小学教员和房产主们,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什么威胁。所以,"红八月"的残忍暴行,完全是一种在革命名义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为。

文革结束后,六六年八月的受难者们都得到了"平反",家人得到了一点钱,标准的数额是四百二十元。但是他们的悲惨遭遇却一直不准许报导。

中国书店里二十年来唯一出售的一本文革通史《大动乱的年代》(作者王年一)中,对红八月惨案只写了一句:"据统计,在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一千多人。"这个句子有意回避了主语,即打死人的凶手。而更重要的是,一千多人被打死,在一部六百四十八页的书中怎么能只写了一句话?这不是死了一群鸡或者鸭啊。

对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诚实地写出历史事实和理性地分析历史因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人民的生命以及残害生命的犯罪行动持有什么样的司法和道德判断标准的问题。

【难忘岁月】

一九六六,恐怖而动荡的"红八月"

• 博讯螺杆 •

就大中专院校来说,虽然已经停课半年多了闹革命,但我认为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文革才算真正开始,在此之前的一系列批判运动,不过是未雨稠缪。这天,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三天之前,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附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旁边,这无疑是很明白的告诉人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出了赫鲁晓夫。政治嗅觉灵敏的人都会意识到,毛泽东这张大字报,矛头应该是对着刘少奇来的。接下来,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了文革筹委会。全校师生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同时",也开始了揭校党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校长李纪,副校长李传文都遭了炮轰。相比之下,李纪是地方的土改干部,比李传文识时务,认罪态度极好,而师级转业的李传文则面对"革命"态度傲慢,一声不吭,他和校医夫人一起被师生批判,平时打扮漂亮的夫人现在变成了"大眼贼",木然的瞪着眼面对一切。三把手刘佑军是团级转业,大老粗没文化,外号叫栽树校长,一天到晚就知道栽树,但现在是文化革命,也就是革文化人的命,谁来革文化人的命?当然是工农兵大老粗,所以他就当上了筹委会主任,成了一把手。

八月中旬,工作组又按上头指示,灰头土脸的撤出了,工作组撤出前几天,领导筹委会开了一次批斗校长李纪的大会,教工委员宋元贵对批斗会张罗得最欢,他外号叫宋二逼,是个复员军人,学校的货车司机,真正的大老粗,因为李纪被打倒了,给他开车的司机也就被打倒了,在这校园里,宋二逼的唯一仇敌就是小车司机老张头,一个老国民党员,给国民党军官开过车,而他宋元贵是共产党员,还是复员军人,却开大卡车,这对他太不公平,所以运动一来,他首先贴出了大字报揭发老张头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于是,老张头就成了校工中的第一个牛鬼蛇神,脖子挂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宋元贵长期开大卡车的不满和对老张头的嫉妒也就得到了发泄。

批斗会是筹委会学生主任孙新主持的,但宋二逼一直担纲,他对校长李纪与秘书孙春芳的 男女关系丑闻特别感兴趣,就念起了一张群众递上来的纸条,逼着孙春芳上台交待她与李纪是 怎么搞起来的,孙春芳是个四十几岁的中年女人,这个年纪的女人,大约已经失去了羞耻之心,谈起男女之间那点污糟事,就如聊家常一样。为了表现革命,她老老实实的,对着话筒毫不脸

红地交待道:那天我给李纪倒了杯茶,李纪突然搂住我就亲吻,脱我的裤子,摸我的下身,然后我们就在办公桌和沙发上发生了关系……,话音未毕,台下师生一片愕然,女生中还有人发出尖叫,这时李纪已经怒不可遏了,大喊:孙春芳你不要脸污赖好人!可能这个女人还是想要点脸的,只见她跳到李纪身上又撕又打,李纪挂着大牌子也拼命招架,二人滚做一团,在一旁陪斗的牛鬼蛇神又躲又闪,工作组的人也哭笑不得的上来拉二人下台。台上大乱,台下哄堂大笑,一场批斗会变成了闹剧。

在开批斗会之前,我甚至天真的认为,班主任何宝珑是校长李纪的红人,应该让他知道开批斗李纪的消息,这样他会有个思想准备,能揭发李纪的"三反言行",坦白从宽嘛,就决定拉何老师一把,毕竟我是他的课代表,平时也没少受他点拨,知恩图报吧,就偷偷的到了隔离室,一语双关的对何宝珑泄露天机说:明天就开李纪批斗会,你要老实坦白和李纪的关系啊。其实,何宝珑谁的红人也不是,他就是有才干,李纪比较欣赏他而已。我以为没人知道我单独与何宝珑见面,但忽略了何宝珑是正在被监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我的行为被团小组长铜蛤蟆刘淑芝指成替黑帮分子通风报信,为什么刘淑芝叫铜蛤蟆?这和形象与声音有关,他们积极分子开了会,把这件事还当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我又被怀疑成何宝珑的同党了。那天,班长徐宝成对我诡诘的一笑说:你背着我们见了何宝珑是吗?这使我立即产生了一种不祥预感,如果我给何老师通风报信,那是不是意味着与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一丘之貉?工作组已经说过,不仅教师队伍中有反革命分子,学生中也有,想来想去就不寒而栗了。怎么办?我想这时必须积极的表现自己,不能再接近牛鬼蛇神给自己惹麻烦了。

这时一个机会来了,一个青年教师找到我,要我画一幅漫画《群丑图》,画上是李纪为首的校党委黑帮,人物有三十多个,令我吃惊的是,李纪居然是陈梦非等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于是,我把熟悉的面孔画得惟妙惟肖,不认识的面孔,那些青年教师就指给我看,我只要看过一眼就能画出他们的特征。《群丑图》中,最惹人发笑的是教测绘的老师谷永强,画上他穿着日本和服,手握折扇,扇上写着"洋奴谷三郎"。谷老师确实是喜欢日本的一切,他骑的自行车是富士牌,戴着精工舍手表,举止作派都是日本式的。《群丑图》一贴出来,立即引得全校师生喝彩,但《群丑图》的后果是,凡是画进去的教师都变成了牛鬼蛇神。这幅漫画和后来的造反派头头经历,使我在多少年后,母校的老师还能深刻的记着我,远远的就能叫出名字。后来我还得知,谷永强偷偷地收藏起了那张漫画。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各地也纷纷闹起了红卫兵。十九日那天早上,学校操场的广播喇叭里突然有个女声尖声凄厉地高声宣布:"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大红旗,我们父辈拿下了这个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一代一代往下传……全体黑五类狗崽子和牛鬼蛇神们等一切反动派你们听着,现在正告你们,沈阳市红后代总部成立了!从今以后你们只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群众的专政改造,不许乱说乱动……"。

原来是学校里的革军革干子弟们成立了《红后代》红卫兵。真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校园里居然有这么多干部子弟,而且女生居多,她们都是平时不爱学习,成绩也不好的同学,而且很低调,不那么惹人注意,怎么突然一夜之间就咤吒风云了呢?广播《红后代宣言》的是J一班的刘星桃,一个满脸雀斑的姑娘,她们,还有魏朝阳(省委组织部长女儿),江红(沈阳军区政治部某首长之女)包括我们班的刘淑芝等二十几个女生,据说都出身于高干军干家庭。她们佩戴"红后代"袖章,身穿旧军装,腰扎铜扣军用皮带,飒爽英姿的甚是好看。

早饭后,操场上一群同学在激烈辩论,红后代把共青团徽和团旗扔在地上践踏,声称这是造团中央的反,因为过去"团中央的大门始终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敞开着(胡耀帮语)",这时,学生会干部、团干部和反对红后代这种做法的同学都围了上来,与他们辩论。我也参与

了这場辩论,尽管我不是团员,但还是个学生会干部,觉得说话硬气,有责任也有义务站出来 "反对错误思想",我真的对红后代那骄傲无耻的宣言很反感: 凭什么老子英雄儿子就好汉,老 子反动儿子就混蛋呢? 这岂不是龙生龙凤生凤,天生老鼠会打洞的纳粹血统论? 事实上,中央 许多领导人出身都是地主资本家啊,比如周总理和刘少奇的家庭就都是大资产阶级,毛主席的 家庭也不是贫农,应该算是富农吧。

我同班的徐宝成、陈文忠、步广增等几个男生都是首批红后代,除了步广增爸爸是大连军分区的后勤部长,余下的都是企业党政干部子弟,他们当上了《红后代》,走路的姿势都变了,脚尖着地,一踮一踮的,特别是陈文忠,看了此人的猥琐样,我就相信以貌取人这点道理了,他外号叫干虾米,我睡在他对面上铺,每天都能看见他在被子里肆无忌惮的手淫,动作象划船,我真替他累得慌,他从来不敢去学生浴室,怕同学们耻笑他那硕大的行货。现在,他那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无比优越样子,令人可笑又令人恐怖。可是,与一千多同学相比,他们那三十几号人是不是显得太少啦?连百分之五都不够,不折不扣的一小撮。而且令我惊异的是,刚入团不久的王振江和王福刚居然不是《红后代》,原来他们是工人子弟,父母不是干部。现在,只有革军革干子弟才有资格加入《红后代》,工农子弟只是团结对象。《红后代》可能也觉得自己很孤立,为了壮大队伍,又拉起个"外围"组织叫《红卫兵》,吸收那些特别革命,想往成为《红后代》的工农子弟加入,但出于对血统论和"红后代"们趾高气扬的反感,也没有多少同学加入这个所谓的"外围"。《红后代》很快就成为全校师生中的少数派,当然,校筹委会是被《红后代》控制且领导了。

这天,在学生会副主席李志勇倡议下,《红后代》的反对派很快就成立了《五四红卫兵》,我也是发起人之一。李志勇是大连人,高年级学生,和孙新一样都是深度近视。《五四红卫兵》是与红后代对着干的,章程也简单,就是坚持前团总胡耀邦在共青团九大上的讲话精神,即"团结大多数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一道闹革命"。《五四红卫兵》的袖章就是一个共青团徽标志。我整夜的制作袖章,还刻印了《五四红卫兵》宣言,那天夜里,找到管仓库的老关头,要了他珍藏很久的书皮红纸,那是一种成卷的厚厚的硬红纸,写下了"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巨幅对联,足足有十多米长,悬挂在教学楼红后代对联的旁边,来与血统论对抗。看出来,老关头对《五四红卫兵》是很支持的,因为他做为一个普通的校园杂工也受到了攻击,有大字报说他是旧社会妓院的大茶壶,老关头不识字,但知道有他的大字报,是揭他历史的,为此想不开,喝了好几天闷酒。我也不知道大茶壶是什么意思,也许就是烧茶的佣人罢?后来在工厂听年纪大的工友讲才知道,大茶壶除了做茶房,还有项工作是提着茶壶侍候妓女们洗屁股,那年头毕竟还没有淋浴器,只能用壶嘴对着屁股浇水。

红后代成立那天,沈阳市举行了纳粹冲锋队式的盛大庆典游行,沈阳军区给红后代配备了军车,摩托车,发行了《红后代》杂志,创刊号是精美印刷的,可以和《红旗》媲美,《红后代》在中山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集会过后,各地就都开始了暴力的"革命行动"。我校红后代的"革命行动"和各校一样,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牛鬼蛇神游街武斗,这真是一场比天灾还难预料的灾难,只要有人点名揭发或贴出大字报,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随机安上各种罪名,然后立即被戴上高帽子,加入牛鬼蛇神队伍。那天,除了青年教师,老教师们已经没有几个不是牛鬼蛇神了,所以队伍长长的,足有五六十号人。平时学生们讨厌的,人缘不好的老师,这会儿都变成了牛鬼蛇神。教结构的教师石明德,只因前妻来学校贴了他的大字报,揭发他喜新厌旧,这时戴上了"大流氓"的高帽子,体育教师王满瑞,也被人莫名其妙的点名游街,派发了一顶高帽子,但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拿着高帽子来找筹委会问,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帽子上应该写什么?筹委会的学生主任孙新想了想,也琢磨不出什么罪名,拍拍脑袋就说,那你就在帽子上写:打倒王满瑞吧!于是王满瑞老老实实地在高帽子上写下了"打倒王满瑞吧!"这六个字加感叹号。

游街开始了,只见一片白色的尖尖的高帽子晃动着,牛鬼蛇神们从教学楼里的牛棚里琅琅

呛呛踱出来,《红后代》们手握铜头军用腰带,象押解俘虏一样列在两旁,不停地用腰带抽打着他们,全校师生都站在《红后代》和"外围组织"的队伍外高呼口号,人人自危的在心里打鼓,为了自保,大家都极力表现自己是最革命的,只能将最后的一点良知隐藏起来。这场游斗,也是众人报私仇和发泄个人恩怨的机会,很多青年教师都使出小聪明,在背后窜掇学生打骂以老教师为主的牛鬼蛇神。不过J4班同学好象受了点良心约束,还没有动手打班主任何宝珑,但外班的红后代却将他打得在地上爬,化学教师王吉人是M1班的班主任,平时对学生不大和气,这时遭了秧,那些平时被他挖苦过的红后代们,这会儿就狠狠地用铜头皮带抽他,打得他满头是血,一路哭喊着:毛主席啊您救救我吧!他那当校医的老婆在人群里泪流满面的,不敢哭也不敢不看。

这场批斗过后,何宝珑的右胳膊被打断了,因为他"太有才"了,双手能写一笔漂亮字,在课堂讲台上不用移步,左手写完了换右手,一个青年数学教师,精通琴棋书画,写了足足百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和日记,结果被自己的学生出卖了,告发他的同学叫罗万忠,谁也不相信,平时老实巴交的罗万忠会对自己的老师来这手,但既然大字报贴出来了,那何宝珑就死定了,因为他出身地主,就凭这出身,他也死定了,再说青年教师们也都嫉妒他,凭什么何宝珑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结果在这场批斗会上,他们就挑唆学生们下黑手打何宝珑。

第二天,《红后代》分兵两路革命行动,一路去砸庙,另一路去抄牛鬼蛇神的家,同时居高临下的"命令"《五四红卫兵》配合破四旧,但《五四红卫兵》却没有理睬它,通报内部说没有总部命令谁也不得擅自行动。《红后代》从校办主任朱夏家里抄来了一大堆"封资修"书籍,我看到《红后代》们将那些人体美术画册一页页的撕烂再扔进火堆里,心里暗暗叫苦,这些土鳖根本不懂艺术,太可惜了!从谷永强家里抄来了一皮箱手表,但都是坏表,谷永强是测绘专家,会修理精密仪器,这些坏手表是他一生的积累,尽管是一箱子坏手表,也足以做为资产阶级的罪证了。最穷的是陈梦非,家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几管破毛笔。要说陈梦飞,那才真正是写手,几十张大字报几万字,全部是工整的中楷,无一漏字错字,一个老国民党人居然对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进牛棚前是校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

其实,牛鬼蛇神家属们早就把惹是生非的四旧都销毁了,朱夏的书籍画册和谷永强的一箱子坏手表,可能是家属们认为世界名画和坏手表应该不在四旧之列,又是主人心爱之物,就怀着侥幸藏匿下来,结果还是被抄了。那天夜里,《红后代》还把教工家属院附近居住的一个流氓,外号叫老黑的活活打死了,居民们都奔走相告的拍手称快,那个流氓是个单身汉,偷鸡摸狗的有点小名气,经常到校园来骚扰女学生,不过在教工家属院里,还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并没有招惹谁更没犯死罪,但除掉他,邻里们就觉得安全多了。文革中,象老黑这样没亲没故的单身汉应该不计其数,死了,也就死了,没有人会替他们申冤的。

群众最响应《红后代》的,是斗争破鞋的革命行动,"破鞋"就是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好象听长辈们说过,历次运动一开始都少不了斗破鞋,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若想发动群众,必须先迎合痞子们的低级趣味,斗破鞋是少不了欺负女人的,但痞子们就是对欺负女人特感兴趣。那些日子,只要一听见锣鼓宣天,就是破鞋游街了,在解放卡车上,《红后代》押着一两个男女,都被剃了阴阳头,分不出男女了,脖子上挂着一串破烂鞋子。过了不几天,《红后代》在教工家属院又挖出了一个"女特务",这可怜女人,曾经嫁过国民党军官的,她只是保留着和自己死去丈夫的结婚照而已,结婚照上的丈夫是戎装的,有青天白日帽徽,被《红后代》抄家搜到了,就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一个"革命群众"壮汉是她的邻居,手握一只大棒在台上打她的屁股,打一棒子问一句,逼那女人交待电台藏在何处,那女人捱不住打,只好说电台埋在自家小院子的鸡窝底下,《红后代》和革命群众们听罢蜂涌而去,挖了两米多深,除了蚯蚓什么也没挖到,结果这女人又捱了一顿暴打。

这天晚上,《红后代》又去砸庙了,这次《五四红卫兵》不得不做出积极姿态,也参与了砸庙行动,他们砸的是离学校最近的,大南门里的药王庙和小南门天主堂,一同砸庙的还有外校《红后代》和"外围组织"。庙里的住持是个老尼姑,据说是省佛教协会的什么角色,她也革命了,高举着毛主席语录,领着出家人列队欢迎,高喊"支持红卫兵小将革命行动",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虔诚供奉的泥菩萨们一尊尊被红后代们套上绳索,喊着号子拉倒在地。尘埃中,红后代们抄走了庙里所有的铜佛铁器,拉去冶炼厂回炉,泥菩萨们被拉倒后,小将们又发现它们的肚子里还藏有很多信众奉献的珠宝玉器,于是都被开肠破肚,脑袋搬家,搜走了财物。这时,又有人提出烧藏经阁的经书,老尼姑见事不妙,就急忙打电话给老相识省公安厅长宋光,要他出面制止烧经书,宋光来了,刚开口说话,就被一阵 "造反有理打倒宋光" 的口号打断,带头喊口号的居然是他儿子。最后,堆成一座小山的经书还是被付之一炬了。红后代开进了药王庙,宣布要在这里吃住三天,要教育出家人破除迷信,要还俗自食其力,不再做封建主义寄生虫,老尼姑只好给小将们炖猪肉吃,为了表现自己革命化,尼姑们也陪着小将吃起了猪肉,还手握着毛主席语录,高唱语录歌与红后代们一起留了影。

《五四红卫兵》成立后,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几天内就壮大到八百多人。我在成立大会上说:工农出身子弟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应该争口气,给他们出身革军革干的看看!看看谁最革命?这句话赢得了激烈的掌声。但《五四红卫兵》是短命的,《红后代》抓住了我那句"出身不好的要争口气"的言论大做文章,说是煽动黑五类狗崽子造反,又由于《红后代》抄家时,《五四红卫兵》按兵不动,就贴出了"革命通令",说《五四红卫兵》抵制破四旧运动,包庇牛鬼蛇神,勒令解散,这招的确厉害,"通令"贴出后,立即就有大批出身不好的同学声明退出,其中有个叫赵斌哲的机械班同学,不仅大造自己剥削家庭的反划清界限,大骂了一通黑五类爹妈,还在声明中反戈一击,添油加醋的给《五四红卫兵》定性成反动组织,这就更加速了《五四红卫兵》的解体。

李志勇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主张自行解散组织,常委中的几个前学生会干部兼团干部,因出身不好,怕被扣上反革命帽子也都附合他的意见,因为据说中央首长最近有讲话,不准黑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红卫兵,那么《五四红卫兵》就应该早解散早主动,不能等到被取缔,那就被动了。我争辩说,《五四红卫兵》成员主体是工农子弟,不是黑五类,只要出身不好的同学退出常委,就不能算黑五类狗崽子造反,《红后代》排斥工农子弟,我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这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但我孤掌难鸣,也说服不了大家,最后只好同意解散。就这样,才成立了不到一星期的《五四红卫兵》被迫解散了。解散那天,我暗暗下定决心:他大爷的,有朝一日,咱哥们势必卷土重来,不打垮《红后代》决不罢休!他大爷的!

【荒唐年代】

"文革"中看电影

陆谷孙。

那是8亿人民8个样板戏的"文革"年代。因为戏少,为疏解文娱饥渴,就一戏多演,连带无线电加大街小巷的有线喇叭,无休止地播放其中的唱段,搞"饱和轰击"。一次,学校请来一位御用才子宣讲,说江青同志如何呕心沥血,巨细靡遗,精益求精培植那些样板戏,一会儿指示正面人物服装上的补丁也应该打得整整齐齐,以免褴褛而损害高大形象(如不信,可看李玉和的铁路职工制服),一会儿指示那儿的布景和灯光都要"出绿",弄得内景像个户外大草原。那种讲座可不像今天的于丹或易中天,爱听不听由你,那可是师生必修的功课之一,要点名排队入场。照例,听完之后,随即放一场样板戏电影,就算你看过了N次,也得克服"审美疲劳",

虔诚正襟危坐,苦捱两小时,准备看戏之后,各回所属"连队"(当时都搞军事编制,"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嘛)认真讨论。无怪乎,一些"文革"的过来人听说今天的教育部规定,作为国粹教育,样板戏京剧进入中小学课堂,都面面相觑,怛然失色,以为要"王政复辟"了。

这边银幕上正唱得起劲:"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呃呃呃吧出监……"那边后座突然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噜"。黑黢黢的剧场中,大家齐齐往后望去,主要倒不是寻找声音来源,而是想把这位不虔诚的观众赶快弄醒,免得麻烦。打呼噜的是我的老师伍况甫先生,一位类似19世纪英国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人物:自己终身不娶,侍奉寡姐。这位伍先生与他的胞弟、同样供职于我系的一位曾经锋头甚健的伍教授,迥隔霄壤。况甫先生永远穿着一身比自己身躯小一至二号的衣物,上身的"人民装"绷得连纽子也扣不上;圆口布鞋挤脚,行路如踮地;脑门覆一顶污渍斑斑的"解放帽",根本遮不住那肥硕的后脑。大一时,他来代课教过几节语音,那发音字正腔圆,远胜其侈谈美学和文论的胞弟,而且一肚子的"杂学",诸如 olive 乃地中海盆地特产,不是中国人熟知的橄榄,应称"齐墩果"或"(地中海产)油橄榄",panda 叫熊猫是俗称,学名应作"猫熊",这些信息我从学生时代牢记到今天。我怀疑他是学过拉丁的。

伍况甫先生开会时永远挑最远的离群一隅落座,寻常不发言,也极少与人交谈。孤形只影,那时开会又无不"马拉松",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小盹的条件反射。这时,只听见剧场里一个尖利的女声大喝:"伍况甫,侬要死啊,看革命样板戏打瞌冲!"那是来自纺织系统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位队员的怒叱。事后,伍照例被一顿狠批。要知道,当年如对革命样板戏大不敬,小则"吃生活",大则吃"花生米"也有可能。上海不是有个说书先生在茶楼讲样板戏,难免添枝接叶,摆些小噱头,结果真给枪毙了。不过,"熟则生狎"(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是条规律,譬如我的一位师弟打桥牌得一手多张同花好牌时,就会唱出"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成功将某种花色"打大"(即英文里所称 establish)时,得意忘形,脱口而出,便是:"大吊车,真厉害……"师弟唱戏,天机尽泄,所以屡战屡败。

江青曾三令五申,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相比,正面人物为主。可是《沙家浜》里有两个反面人物特别受欢迎:草包司令胡传魁和阴阳怪气的刁德一。说也奇怪,群众就爱看他们两人的戏,看两个汉奸跟阿庆嫂斗智。我们下乡劳动,工余唱戏娱乐贫下中农,唱别的段子,无人要听,这时田头倒是会齐声起哄:"来一段智斗!智斗!"我曾暗自思忖,要是"文革"再拖它几年,想来这段戏也非给江旗手删了不可。"文革"时偶尔也放过《列宁在十月》之类的旧片子。观众喜看爱学。列宁不是爱两手拇指插在西装背心里大发宏论吗?学生红卫兵就学样,只是西装背心变成了夏天的男式汗马甲。双手一插,自觉成了革命导师,说话便肆言无惮,百无禁忌,有的学我们这儿的革命导师,用湖南高腔喊出"yinminvansai"(人民万岁),有的仿各种方言学污言秽语,包括"标准沪骂"××;如我记忆不谬,"面包会有的"这句名言也是当年这样流传下来的。还有个哭哭啼啼的《卖花姑娘》,据说是北邻慈父领袖夫人的杰作,可与此间"国母"的大手笔有得一比,也算热过一阵。

放批判电影时的盛况最为令人难忘。看《不夜城》之前先把主演孙道临揪来批斗一通(巴金因为一直被关押在复旦,自然陪斗);《兵临城下》、《早春二月》、《清宫秘史》……每逢放这类内部批判片时,礼堂门前早早已是麇至沓来,人头攒动,据说还有自己仿造戏票——原来造假并非今日始——混进场内,一场映完,兴犹未尽,赖着不走,续看下场的。曾有传闻要放《第四十一》、《一个人的遭遇》等苏修片,本以为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等着一饱眼福,但不知什么原因,终未成真。倒是在1974年前后吧,随着邓公复入中枢,突然在正规影院放了三部《山本五十六》等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的日本电影,是因为小毛头林立果他们搞了个唐德刚先生所称的"童子军帐篷笔记"《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提到了这部日本电影里的"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等等,看了电影有利于批判,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用意和玄机?这就非你我草民可知了。反正那真是一次"文革"中难得的"眼盛宴":超宽的银幕、七彩的画面、大海、战舰、

缀了勋表笔挺的洁白海军制服、海空立体、关于二战的"宏大叙事",一下子就把那呕心沥血的 八个戏比下去了。电影散场,我曾听人小声感慨:"这才真叫电影哩。"

□ 原载《南方周末》

【往事追忆】

我参加的李洪山辩论会

• 杜钧福 •

确切地说,我参加的是和李洪山辩论的辩论会,而且我也不能说是参加,只能说是旁听。时间是1966年12月5日晚,地点在林学院的一间教室里。是一些红卫兵要求和李洪山辩论,约好时间地点后贴出海报被我看到了。我不是去和李洪山辩论的,而是想看看李是个什么人,说些什么。

我是吃完晚饭去的,坐在靠窗的一个课桌上。不一会,人们就来齐了,一共几十人,看来主要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大部分看样子是中学生,年纪不大。李洪山什么模样现在记不得了,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没什么特点。

李洪山首先讲他们的观点,然后大家发言。有两位自称清华大学学生的人拥护李洪山的观点,其余的发言者大抵是反对派。李洪山的原话我当然不能记忆了,印象中和他大字报上的观点差不多,说中央文革未经选举产生,是不合法的,要怀疑一切,只有毛主席可以领导,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他在其它场合还讲过拥护谭力夫的大字报,这一天似乎没有说。

反对者的话也不记得了。之所以不记得,原因之一是无论李洪山还是他的反对者,说话逻辑性都不强,辩论的层次不高。

但是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的是这一点: 当有很少数人不是据理反驳, 而是给李洪山扣上"反中央文革"、"反革命"的帽子时, 遭到与会群众一致的反对。

我当时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坚决反对李洪山的。我不认为中央文革不可反,但是李洪山的道理都不能说服我。我认为他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

但是,我非常欣赏这些小红卫兵维护民主讨论的立场。虽然他们认定李洪山说的道理不对, 层次也不高,但他说什么,甚至反对中央文革,是他的权利。而广大群众,甚至这些来自各地 的小红卫兵都知道要维护这一权利,这正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成果。在这个运动深 入开展以后,反对动辄将普通群众打成反革命,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我为 达到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非常高兴,我感到和这些小红卫兵的思想相通。那就是,李洪 山说了什么,红卫兵们说了什么,可能是原则性的问题,要辩论明白。但是,要保护每一位辩 论者,这个原则应高于所有原则。李洪山是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但是这个运动 的宗旨就应当包括保护李洪山这样的反对者。

这以后,我到外地去"串联"了十几天。12月底回到北京后,发现形势大变。李洪山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了。我院那几个保守派头头,也被认为和李洪山有联系,开会批斗了几场,保守派组织彻底解散。

我虽然有些幸灾乐祸,但也有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局势发展和我期望的大不相同呢?为什么不允许有自由讨论呢?

要知道,我们这些在文革前受过正统政治教育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自己的想法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的时候,总会想是不是自己错了,而且认为这就是"思想改造"的本来含义。所以这次,我就开始想,是不是我自己错了?对那些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政策的人,根本就应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于是,在我们战斗小组的会上,我就作了检讨,说我原来的想法,反映了一种资产阶级平等自由观,而未能领会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意义。

当然,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既然李洪山的发言权被剥夺,他的反对者的发言权很快也同样遭到剥夺。

我至今仍很怀念林学院那个初冬的晚上,怀念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稚气未脱的小红卫兵。 我感觉,民主、自由这些普适价值的种子本来就在民间存在,在适当的条件下,是会长成大树, 开花结果的。

□ 原载《记忆》2009年总第32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 (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